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 胡适研究通讯

2011年第2期(总第14期)

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专号



胡适研究会编

2011年5月25日

# 目 录

通讯 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1)
------------------------------	-----

## 开幕式

主持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 耿云志致开会词	(5)
二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先生致欢迎词（张宪文教授代读）	(8)
三 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致词稿	(9)
四 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致辞	(11)
五 安徽绩溪县副县长周小红致辞	(14)
六 陈宏正先生致辞	(16)
七 宣读贺信	(17)
1, 蔡元培研究会的贺信	(17)
2, 李大钊研究会的贺信	(18)

## 论文报告与讨论

大会报告及分组讨论	(19)
-----------	------

## 闭幕式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汪朝光

张朋园教授的发言	(22)
陈方正教授的发言	(23)
章清教授的发言	(25)
朱文华教授的发言	(26)
张德旺教授的发言	(27)
吴根友教授的发言	(28)
胡适研究会副会长欧阳哲生教授作学术总结	(29)

## 文章选登

张朋园：胡适最后的一天	(34)
胡文立、胡毓平：耐人寻味的史实	(37)
陈之藩先生书面发言	(38)
附录：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参会者名录	(40)

## 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本刊讯 由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于 4 月 17-18 日在南京举行。有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中国大陆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六十多位学者到会。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长应邀专程到南京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十五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张朋园教授，还有来自刚刚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灾难的日本老专家山口荣教授以及来自美国的李又宁教授。

4 月 17 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幕式，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担任主持。

首先由本次会议的发起人，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致开幕词。他回顾了 30 多年来胡适研究取得的进展。指出，当年胡适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不能出版胡适的东西。到如今，以各种名目汇编出版的胡适著作已达数百种。从专题文集到综合文选，直至《胡适全集》，都已相继问世。而研究胡适的论文、文章已超过 2000 篇，专著已超过百种。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先后举行六次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其中三次是国际研讨会。还有《胡适研究丛刊》、《胡适研究论丛》以及《胡适研究通讯》的编辑出版。现在胡适研究已被称为“显学”。由此，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书界，相当多的人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人们认识到，胡适先生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

耿云志先生指出，尽管胡适研究已经取得很可观的进展，但胡适研究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很高兴看到不断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加入到胡适研究的队伍里来。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协力，秉持学术良知，共享知识和真理，把胡适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先生致辞，他表示，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说几句祝贺的话。他说，我们大多同意胡适是近代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的影响方面之广与程度之深，在近代世界各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人物中都很少见。王副院长说，胡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有影响：在文化方面，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们今天仍深受其影响。

在学术方面，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小说史考证、禅宗史研究、水经注研究，及他对中国思想学术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都有开创性的成绩。此外他提倡整理国故运动，提倡怀疑、批判的精神，对近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在思想方面，尽管他对科学的了解并不深入，但终生信奉“民主”与“科学”，尽力使这两种

精神不但能融入政治与学术之中，而且还能广及政治和研究之外，成为一切人生活的标准。胡适晚年，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兼任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他这两项工作对台湾带来深远影响。

王副院长最后说，在纪念胡适生 120 周年这样难得的时候，我们追怀他的德业，除了心生激励外，也希望胡适先生所播下的种子能常留人间。

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李又宁致辞说，她很荣幸参加这样一个很重大的学术研讨会。她从最近美国出版《虎妈战歌》这本书引起巨大反响谈起，说虎妈这种教育方式，造就了中国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胡适和蒋介石都是虎妈教育出来的人。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详细描写他母亲对他如何严格要求，使他从幼年起，就培育起责任心和使命感。胡适到美国留学，在那里学会了演讲，这对他以后的事业，有很大的助力。李教授认为，胡适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哥大在纽约，纽约是美国的华人中心，对中国留学生非常有意义。他选择杜威作他的导师，实验主义指导他的思想，使他把握住时代的潮流，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导师。

安徽绩溪县副县长周小红致辞，她首先代表胡适先生的家乡——绩溪县委、县政府和 18 万绩溪人民，向大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专家、教授，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敬意；向大会的组织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她向与会学者介绍胡适先生的家乡绩溪的历史和现状。她用五个字来概括绩溪的特点：一，“小”，绩溪是一个玲珑精致的“袖珍小县”。全县面积 1126 平方公里，人口仅 18 万。二，“秀”，绩溪“山川秀美”。三，“厚”，是指“人文厚重”。四，“灵”，即是“人杰地灵”。五，“畅”，是指“交通畅达”。

最后，周副县长说，家乡人民为纪念胡适先生，准备将毗邻适之街的县房管局迁出，在此兴建胡适纪念馆。并企盼胡适纪念馆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先生的一个中心。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教授，因病未能到会，他代表南京大学所作的欢迎词，由张宪文教授代为宣读。

他首先代表南京大学，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他追述了胡适先生与南京，特别是与这里的几个高等学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胡适先生曾在这里做过多次讲演，还有许多重要著作和重要文献也是在这里起稿的。潘副校长还介绍说，南京大学一直有研究中国历史上杰出人物思想的传统。已故校长匡亚明教授曾经领衔组织撰写了包括 200 多位思想家传记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已于 2006 年整齐出版，并获得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改革开放以来，胡适作为一个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成为 30 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和中华民国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先后有十多位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以胡适的学术与思想为中心，教师和研究生发表了许多有关胡适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而另外一个与胡适研究有关的是，南京大学最近刚刚领衔完成了 15 卷本 650 万言的《中国佛教通史》。胡适之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陈宏正先生，他说，胡先生是最伟大的一个作家，他从 15 岁办《竞业旬报》开始，写到 1962 年的 72 岁，写过两千万字，算是多产的作家。他秉持的，他所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向上提升，能够更进步，他所主张的是民主、科学与自由。这是他终身坚守不渝、终身努力并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他又说，胡先生待人非常友善，非常热诚，他帮助过很多人。胡先生自奉节俭。有一次他儿媳妇跟我说：老太爷就是喜欢帮助人家，他自己穷的没有钱了，他也要帮助人家，这是胡先生精神伟大之处。大陆的文化部长去年到台北去，一下飞机就是去胡适墓园和胡适故居，向胡先生行礼。可见，中国人的心底对胡先生是充满着怀念。

开幕式上还宣读了蔡元培研究会、李大钊研究会给本次会议发来的贺信，及胡适先生的学生陈之藩先生的书面发言。

开幕式之后，举行大会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朋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相继作报告。他们报告的题目依次是《重读〈新思潮的意义〉》、《胡适的最后一天》、《论胡适与科学》、《胡适、蒋介石与 1950 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

从 17 日下午开始，到 18 日下午 4 点之前，会议分两组一共举行十场分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论文学术水准较高，讨论热烈而深入。

4 月 18 日下午四点二十分，会议举行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主持。

在闭幕式上，先后有六位学者发言，都很精彩。他们谈到自己对此次会议圆满成功的观感，谈到对胡适研究的体认或进一步推动胡适研究的建议。

张朋园教授说，他对这次会议的印象非常深刻，感觉参会的大多数论文都很有内容，写的非常的好，为大会的成功给以恭喜和道贺。

张先生说，我有一点点感想，就是觉得胡适的性情温和固然是天性，同时与他留美有关。我觉得留美跟留欧洲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决然不同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阶段，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跟欧美的民主政治发展的传统脱了节，从欧美式一贯的全民式的政治，一变而为威权式的政治，这一个变化对我们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诸位可以回想一下，二十世纪上半影响中国的是什么人，多半是留欧洲的，从欧洲回来的，尤其是激进主义者。激进主义多半是威权

主义。像胡适这样的人，在美国真正受到民主的气氛的熏陶，观察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能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极为透澈。激进主义者、威权主义者在中国的政坛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因那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家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认为激进主义可以很快把中国搞好。把激进主义当作一个理想，拼命向前，其后果如何就不顾了。希望研究胡适的时候，不要忽略美国的问题，不要忽略了美国民主政治对胡适的影响。

陈方正教授发言，先念一段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胡适日记》。指出胡适在回国之前已经立定主意，要塑造，要影响中国人今后的思想。当然，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后来胡适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止于思想，他也同样影响时局和政治。但他对中国实际政治究竟有多少影响，则需要仔细研究。

接着，陈教授提出，胡适强调科学规律、自然规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他对这个概念实际上没有深究，这个是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另外，科学到底是应该以学理还是以实用为主，在这一点上胡适是有矛盾的，他自己也没有定论，没有一贯的思想。还有，他的考据学有多少是得自西方以科学手段来整理经典的启示？这也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研究。最后，陈先生提出，研究胡适，不应总是仰视他，应该平视。亦即平等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他。

章清教授发言主要谈他对“就胡适论胡适”，即还胡适的本来面目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就胡适论胡适”的意义。首先是尽量充分利用胡适本人的资料。其次，就是利用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其他的资料。第三，今天有待加强的是怎么就胡适本人所倡导的精神来开展研究，用冷静的方法探索一些问题，以推进胡适的研究。

朱文华教授发言说，我们的胡适研究事业，从 1970 年代末以来，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了。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现在可以说把胡适研究这个课题，抬高到了一个近似“显学”的地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兴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行现在要考虑，我们的研究工作怎么样与时俱进的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开掘胡适研究的新思路，要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朱先生建议：如果我们再开会，希望考虑安排组织一些同事来专门讨论交流一下在胡适思想、胡适作品教学方面的经验教训。

张德旺教授发言，以他自己的经历见证胡适研究三十年的发展进步。他提出，研究胡适需要各种学科各个地方的同仁进一步共同努力，我们的队伍还应该进一步扩大。他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岸三地的联系。胡适和孙中山、蒋介石、蔡元培一样，是两岸三地学者有共同语言的人物。两岸三地学者加强联系，不仅对胡适研究，还将对中国文化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

吴根友教授的发言，强调胡适研究与其它学术研究一样，都与现实的文化建

设紧密关联。通过讨论与研究，胡适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整体形象或许未来更加明晰。吴先生说，这次学术研讨会使他对胡适研究的兴趣增加了。他自己也是安徽人，觉得以往对胡适的注意不够。此次会议后，对胡适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各位学者发言后，由胡适研究会副会长欧阳哲生教授对会议作学术总结。

他说，这次会议进行了两天，会议议程安排得紧张而有序。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粗略阅读论文的感受，提交本次会议报告并加以讨论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讨论胡适的思想，这是会议的重点。这一类论文又可分为四组：

（一）对胡适思想的理解。（二）有关胡适民主政治思想的阐释。（三）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阐释。（四）有关胡适的科学观及胡适对哲学、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第二大类是讨论胡适的生平事迹和胡适与他的朋友的关系。

欧阳哲生教授说，通过阅读大家提供的论文和倾听大家的发言，感觉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准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大部分论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有些论文是作者精心构织和打造的成果。有些新锐作者的论文读后让人产生“后生可畏”之感，这使我们有信心地说，胡学研究后继有人。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告闭幕。

会后，许多与会者都表示，会议的成功超过了他们的预想。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举办这样的学术研讨会。

## 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开幕词

### 耿云志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朋友们：

由我们胡适研究会和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以及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联合筹备半年之久，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的支持，纪念胡适诞辰 120 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如期开幕，令人非常高兴。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日本、俄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多位学者。他们有的年事已高，却不避远路的辛苦，张朋园先生以八十五岁高龄专程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来自我们的邻邦日本的山口荣教授，年逾古稀，在刚刚遭受强烈地震和海啸灾害之后，仍决定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的真诚，令我们十分感动！内地朋友，有的来自各个大学，有的来自科研机构，有的来自传媒界，我在这里

谨向参加此次会议的所有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深深的敬意！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胡适先生生前死后都是极富争议的人物。曾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对胡适只有批判，没有研究，平心地讨论更无从谈起。但自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30 多年的时间里，大陆学者研究胡适的论文、文章已超过 2000 篇，出版的具有学术价值的专书早已超过百种。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曾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不能出版胡适的作品。然而到如今，以各种名目汇编出版的胡适著作，已不下几百种，从专题文集，到综合文选，直至《胡适全集》，都已相继问世。从 1991 年胡适诞辰 100 周年起到今天，我们已举行了六次规模较大的胡适研讨会，其中三次是国际研讨会。这六次研讨会，有两次我们选在胡适先生的故乡安徽绩溪县举行；有两次，选在胡适先生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北京举办；其余的两次，一次是选在胡适先生曾经到过的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一次是选在胡适先生曾在那里读书和工作过的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上海。这一次我们选在南京，是考虑到，南京曾经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胡适先生经常来这里开会，有时会有很长时间的停留，处理公私事务和会见众多的朋友。我想，南京的老辈，80 岁以上的读书人，或许很多人还能记起胡适先生的形象。所以，选在这里举行第七次胡适学术与思想国际研讨会，应该是正确的。我相信南京大学的师生们，也会这样想。

30 年来，我们主持编辑出版《胡适研究丛刊》、《胡适研究论丛》以及《胡适研究通讯》等等，受到广泛的欢迎。

应当说，30 多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观的进步。我经常说，胡适研究的进展，人们对胡适的认识和了解的加深，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天然尺度。

早在大陆开展胡适研究之前，海外尤其是在台湾地区，在美国，已有学者做了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大陆胡适研究开展以后，海外出现了更多的研究同行，出现了更多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今，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之间，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由于有了大量的胡适著作的出版，有了大量的研究胡适的论著的出版，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书界，相当多的人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曾经被批判得面目全非的胡适，逐渐以比较完整的真实形象浮出地面。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他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他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

作为一位巨星般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先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例如：白话国语的成立，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的主张，个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独立思考精神的提倡，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深远考虑



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方面，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大多已着手从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

我们研究胡适，应当虚心地学习和借鉴胡适先生树立的典范，始终秉持学术良心，以平实的态度去研究问题和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我们的学术良心去唤起别人的理解，用平实说理的态度去与别人共享知识和真理。学术良知应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以这样的方法去从事研究，我们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朋友们，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没有改革开放的环境，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不能设想的。同时，若没有一些重要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是不能设想的。这里我想提到几位长者和老朋友。第一位我想提到的是，我们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他在 1990 年那样的环境下，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支持我举办第一次胡适研讨会。第二位我想提到的是，已故的前人民出版社的老社长、新闻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先生，他曾不顾年老多病，亲自参加我主持的两次胡适研讨会，给我们以巨大的精神支持。第三位我想提到的是刚刚在十天去世的胡适先生的家乡，安徽绩溪县原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先生，他是在胡适的家乡较早开始关注胡适研究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忠厚长者，他在团结各地胡适研究的学者方面，曾经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第四位我想提到的是，我们的朋友陈宏正先生。他只是因为听过胡适先生的讲演，读过胡适先生的书，敬佩胡适先生的思想和胸怀，所以，他对我们推动胡适研究和其他相关的活动都给与无私的帮助。

这里我还想提到，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和我一道推动胡适研究的开展，做出许多成绩的几位老朋友。他们是，武汉大学的易竹贤教授、复旦大学的朱文华教授、安徽大学的沈寂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曹伯言教授、季维龙教授等。今天，除了沈寂教授和朱文华教授莅会以外，其他几位都因年高体弱，未能前来参加会议。我在这里代表此次会议谨向我上面提到的所有老朋友，包括已故的胡绳先生、王子野先生、颜振吾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朋友们：我们胡适研究的工作所取得的进步，尤其是今后要继续进展，有赖于所有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我们的队伍不断加入新人，其中有些很年轻，很有潜力。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我真诚地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协力，共同把胡适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祝愿会议取得成功！

祝愿各位朋友在这里过得愉快！

谢谢！

##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先生致欢迎词

（张宪文教授代读）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

大家好！

四月的南京，莺飞草长，我们在这里相聚，召开胡适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胡适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首先我代表南京大学，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胡适之先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是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风气之先，踞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中国最负国际声望的学者。胡适曾经整理国故，也梦想再造文明，他的思想与学术，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研究胡适的学术和思想，对于总结 20 世纪民族文化遗产，关怀 21 世纪中国文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之先生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曾先后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作《研究国故的方法》和《再谈整理国故》的学术演讲，他提倡疑古，申明研究国故的意义和方法，是“学衡派”重镇难得的朋友；1923 年他在东南大学做《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书院自主研究的精神，主张建设现代大学不必什么都“仪型外国”，要汲纳中国书院教育的精髓，处理好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光芒闪烁。在南高师讲学期间，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脱稿，这是他第一篇有份量的小说考证论文。他的《尝试集二版自序》也是在这里完成的。胡适和南高师校长郭秉文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他曾经对郭秉文校长说过，“如果不是蔡子民先生和我早已有约在先，我一定会到南高师执教。”

南京大学一直有研究中国历史上杰出人物思想的传统。已故校长匡亚明教授曾经领衔组织撰写了 200 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涵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 200 多位思想家，该丛书被称为是新中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已于 2006 年整齐出版，并获得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改革开放以来，胡适作为一个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成为 30 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胡适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仅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和中华民国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先后有十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以胡适的学术与思想为中心，教师和研究生发表了许多有关胡适研究的论文，出版了约十部研究专著，学者们积极参加海内外胡适研究学术会议，参与了《胡适全集》的编纂工作，推动了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另外一个与胡适研究有关的是，南京大学最近刚刚领衔完成了 15

卷本 650 万言的《中国佛教通史》，这是全球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它的出版，让几代学人的夙愿得以实现，胡适之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胡适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研究成果迭出，书店、图书馆出现了胡适研究作品的专柜与专架，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多学科、跨学科视角与方法正把胡适研究推入佳境。我对各位专家取得的成果表示衷心的祝贺。

这次会议，有来自海内外及中国大陆各地的知名学者 70 人，提交论文 30 多篇，涉及胡适研究的各个领域，展现了海内外专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胡适之先生生前最喜欢引用佛经上的一句话：功不唐捐，我相信通过大家努力与切磋、交流，这次会议一定会把胡适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

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在南京大学期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 胡适一二〇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王汎森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说几句祝贺的话。我们大多同意胡适是近代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的影响方面之广与程度之深，在近代世界各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人物中都很少见，充分印证了他在《留学日记》中引荷马史诗的所作的宣告：“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最近我在读英国政治哲学家 John Dunn《现代的革命》(*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书中缕述中国、俄国、墨西哥、古巴等国之革命，我便试着想找一个类似胡适那样在思想文化界有这么多面性影响的角色，但目前尚未能找到。

我们只要粗略一想，便可以发现胡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有影响。

在文化方面，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们今天仍深受其影响。

在学术方面，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小说史考证、禅宗史研究、水经注研究，及他对中国思想学术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都有开创性的成绩。此外他提倡整理国故运动，提倡怀疑、批判的精神，对近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

在思想方面，尽管他对科学的了解并不深入，但终生信奉“民主”与“科学”，

尽力使这两种精神不但能融入政治与学术之中，而且还能广及政治和研究之外，成为一切人生活动的标准。

在政治上，胡适提倡自由、民主与人权，反省、批判威权体制等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胡适先生虽然在《我的歧路》中提到人们认为论政是他的“歧路”，但是回顾他这方面的言论对历史所形成的影响，当年认为是“歧路”的，今天看来其实也是“正路”。

胡适同时是一位政治人物与学术领导者。胡适曾任驻美大使，曾经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北大校长。此后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兼任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他晚年中研院及长科会上的作为。胡适的行政能力显然并不高明，所以傅斯年曾经在一封给蒋梦麟的信上说，蔡元培与胡适的行政能力真是“不敢恭维”，但是他们成为北大的“功臣”，而敏于任事的傅、蒋两人反而成为北大“功狗”，其中固然不无戏谑成分，但多少亦说明了事实。

然而胡适在生命后期的这两项行政工作却对台湾带来深远影响。胡适早年写过《非留学篇》（1914），主张一个国家的学术应该全力发展到一个阶段，一方面能与世界上学术先进之国并驾齐驱，另一方面是国内所需要的各种学术人才自己都有能力充分独立地培养。令我不无意外的是，经过了数十年，胡适“学术独立”的想法并未消失。胡适先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草拟了一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若干年后（1958），他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分向台湾的国民政府当局提出了一个《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这份“草案”不再只是一些构想，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由胡适担任主席，教育部长梅贻琦担任副主席。长科会后来变成国科会。半世纪来，国科会对台湾学术发展的推动贡献之大，是难以缕述的。坐落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则在胡适接掌之后，积极展开各种学术工作及国际联络，此后，中央研究院再度茁壮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

我出生之年，正是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故逝时，我只有四岁，可是因为一些奇妙的机运，我竟间接地在他所遗留的 *institutional legacy* 下工作。十一年前我曾借调到国科会负责人文及社会科学，后来我也曾建议在《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五十周年时召开庆祝活动，事虽未成，却间接促成国科会编印了《闪亮的乐章——国科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在我担任中研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我办公所在的蔡元培馆区，正是胡适当年倒下故逝的地方，我曾发起在墙上挂了一个铜牌纪念此事。后来李远哲院长告诉我，相对于胡适先生的历史地位，这个铜牌稍微小了点。此外，我现在担任的人文副院长一职，也可以说仍是处在胡适的“遗荫”。

我从年纪很轻时，便开始零星阅读胡适的著作。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拥胡、批胡的教师都有，记得初中的一位国文老师就常常在课堂上说“胡适”译成白话文便是“往何处去”，意思是胡适一生皆不知往何处去。但我个人认为，胡适的许多学术或文化上的论点是可以被反省、批判或讨论的。但是任何人只要回顾这百年来的发展就会同意：不管人们怎样反省或批判他，却都不能绕过他。

胡适先生其实还有一个贡献，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注意到，晚清以来，曾国藩日记或曾国藩家书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人立身处世的重要导引。同样的，我周围有不少人也从《胡适文存》或书信、日记等文字中得到人生导引。我所敬重的一位台湾文化界的前辈告诉我，他在十九、二十岁时，曾经异常彷徨，他的兄长就说：“你何不读读《胡适文存》呢？”我自己在成长的历程中，也深深被他那一种引人入胜的文字，富含人情又合乎现代人生标准的生命形态所感染。在纪念胡适先生一二〇周年这样难得的时候，我们追怀他的德业，除了心生激励外，也希望胡适先生所播下的种子能常留人间。

## 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致辞

（2011年4月17日，南京，录音整理）

张（宪文）教授、耿（云志）会长、王（泛森）院长、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嘉宾：

很荣幸来参加这样一个很重大的学术研讨会。我本来只想来听讲，来学习，因此没有准备论文，也没有讲话稿。承耿教授抬举，他让我坐在台上，说几句话。我没有准备，那就照耿教授讲的，即席说几句。胡适先生的功绩和建树，刚才几位领导、学者，都已经说得很透彻，很完整，我也无法再多增加。我想从我个人近年的生活或者学术活动，来说几句，来向各位请教。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是一位华裔女性教授写的，她的这本书叫做《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这本书引起很大反响。这位华裔妈妈养了2个女儿，她用很标准的中国母亲的方式，很严格地将她们教养成人。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法。这和当代美国的家庭教育，大相径庭，所以书

---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华侨协会总会理事暨纽约分会会长，华美族研究会会长。

出版后，引起美国社会各方的反应。英国有个左派作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写了一本书叫《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这两本书合在一起，让西方人十分震惊，他们觉得，如果中国妈妈培养出的孩子都这么能干，中国恐怕真的会统治世界。

我个人觉得，虎妈的这种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蒋介石是一个虎妈培养出来的对现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大人物，胡适也是一个虎妈培养出对现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把他母亲描述得非常仔细，他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这对他的影响绝对是终身的。他母亲对他严格要求，要他努力，目的无非是要他出人头地，为她争气。母亲给幼年胡适最重要的影响是，告诉他人生必须有梦想，有方向，有使命感。胡适的一生有严肃的使命感。他在上海的时候，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办刊物，写文章，非常关怀中国的将来，关怀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后来他去美国，先到康奈尔大学，那是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但地方很小，其实是个小村庄。胡适先生在那里学会了演讲。在西方，做任何事情，对公众演讲，是基本的技能，这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助力。我觉得，蒋介石没有学会演讲，他演讲的能力远不如胡适。

胡适为什么要从康奈尔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康奈尔那个小城里，又是演讲，又是投稿，又有罗曼史，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人物了，那个小城他是呆不下去了。他想到纽约去，说纽约就好比大海，到了那里，别人就找不到他了。他去纽约，算是去对了地方。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出的有名的华裔毕业生，要比哈佛、耶鲁来得多。我觉得，这与纽约这个地方有关系。胡适当年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纽约是美国东部第一大华人聚居区，有个非常著名的唐人街。唐人街对留学生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是留学生出身，对这一点深有体会。留学生忙了一周的学业，吃了一周的色拉、三明治，到了周末总要想办法去吃一顿中国饭，哪怕就是一碗面，一盘炒饭，都要去吃一下。吃了以后，就在唐人街买点菜带回去，顺便再买几份中文报纸看看。纽约的唐人街，在胡适做学生的时候就有报纸，而且不止一份报纸。而且在那个时代，纽约就是在美华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曾去那里活动，那里是美国华人政治活动的中心。到了纽约，华人就不会感到寂寞，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有中文报纸可读，这是很重要的。通过读中文报纸，可以了解国内的情况，回到学校，回到宿舍就可以与同学讨论，思想也就活动了，对于将来自己想要做的事业也就会有了一定的轮廓，或者有一点构想。

我想，胡适转去哥大时，对于将来的事业已经有有了一个构想，这就是成为新

文化的导师。当然，要做新文化的导师，他必须要读一个学位。那时，哥大的情形很特别，他想读哲学，可是他是个华人，他要做新文化的导师，就要读与中国相关的学问，他选的导师也至少要识中国字，懂一些中国的事情。那时在哥大，最著名的汉学家是夏德(Friedrich Hirth)，他是个德国人。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几乎还没有土生的汉学家，所谓的汉学家差不多都来自欧洲，他们大都在中国做过事情，退休后应聘到美国担任汉学教习，夏德就是这样。他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多年，退休后应聘到哥大，成为“丁龙讲座”的第一位教授，是胡适在哥大的真正的导师。夏德是哥大当时唯一的汉学家，杜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兼任教授。但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杜威当做他的老师？第一，杜威不是讲汉学的。胡适如果说自己在海外跟一个讲汉学的外国汉学家研习汉学，那他回国后，在老师宿儒面前还能讲汉学么？他要做新文化的导师，就一定要选一个有一套新的哲学的老美做他的老师，所以他选了杜威。他选得很对。也可见，他那时对自己的事业就有构想。

我们都知道，他的学位论文出了问题。原因是什么呢？他读的是汉学，却成天拉着一个杜威，而他的博士论文有明确的反孔倾向（关于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欧阳哲生教授有仔细的研究），而夏德尊孔、尊儒，不满意胡适的思想倾向。夏德对他的第一中国弟子陈焕章十分欣赏。陈焕章 1910 年写了一部汉学界十分著名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夏德对此书十分欣赏，书成后即立刻替他出版。而胡适有反孔的倾向，他提倡的是如何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移植到中国。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使得他的论文出现了问题。杜威根本不懂中国的东西，但他有一套实验主义的哲学，有名气，这符合胡适的需要。胡适先生虽然论文出了问题，但他的思想符合时代的潮流，他回国后赶上了新文化运动，成了新文化的导师，他的抉择十分明智。陈焕章虽然学问很好，才气也很大，可是他不是时代的宠儿。胡适是时代的宠儿，他提出科学与民主，正合大家的口味，那时候大家崇尚西洋，要求变革。

第二个问题，还是要谈到哥大。最近我出版了四册的“华族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很多人问，49年后到58年前，胡适在纽约住了那么多年，哥大为什么没有请他去当教授？我想这是不大了解那个时候美国大学尤其是哥大的情况所产生的疑问。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想读中国学的人太少，没几个人，就是我当年读学位，攻读中国学的学生也还没几个。那个时候哥大讲中国历史的是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前面提到的拙编的书里也有这个人的材料），他是个很好的学者，那时只有五十多岁，学中国历史本来没几个学生，如果请胡适去的话，他教什么？教中文吗，有一位潘小姐，潘纫秋小姐，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华文教师；教高级中文的是一位有名的翻译叫王际真。教中国哲学，教日

本哲学的是一位狄百瑞先生，他有疑难的时候请教陈荣捷先生。所以，胡适先生不可能在哥大取得教职。他跟唐德刚先生做了口述历史，我觉得大体没有出《四十自述》的范围。那个时候在纽约有很多华人，但是他/她们都很彷徨，既无法求职，也没有积极地去做一些事情。那时有些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希望成立一个第三势力，其中就有两位我们大家熟知的学者，一位是唐德刚先生，一位是周策纵先生。那时有两个刊物，一个是《海外论坛》，一个是《天风》，胡适都没有积极参加，其实那时他可以善用华美协进社在海外做一些文化事业。

我个人觉得胡适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我举出他在哥大求学时期以及 49 年至 58 年他在纽约时期的活动、思想、情况、心境等等就是例子。我说的就是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 安徽绩溪县副县长周小红致辞

在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作为先生的家乡人，参加胡适研究会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胡适先生的家乡——绩溪县委、县政府和 18 万绩溪人民，向大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专家、教授，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敬意；向大会的组织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绩溪因先生与各位学者大家结缘，更承蒙各位抬爱，1991 年 11 月全国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1999 年 9 月“国际胡适学术讨论会”相继在绩溪召开；2001 年 12 月，绩溪县政府在上庄举行“胡适故居修缮工程竣工典礼暨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得到了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2008 年 12 月 1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绩溪县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胡适诞辰 117 周年座谈会”，因工作关系，我未能到会，失去了一次向各位专家、学者讨教的机会，深为遗憾。今天，在此作一弥补，向各位介绍先生家乡绩溪的有关情况。

绩溪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中国徽菜之乡、中国徽墨之乡，也是养育先生成长之地。绩溪的特点，我想用五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小、秀、厚、灵、畅”。

首先说她的第一个特点，那就是“小”，绩溪是一个玲珑精致的“袖珍小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曾在绩溪履任县令，视事三日，即四处游历，归来赋诗一首，其中一句为“指点县城巴掌大”，可见绩溪是一个“袖珍小县”。她作为



黄山北大门，位于安徽东南部，与浙江临安市接壤，全县面积 1126 平方公里，人口仅 18 万，是安徽省人口倒数第四的小县。

**绩溪的第二个特点是“秀”，绩溪是“山川秀美”之地。**游走于绩溪，我相信您会有一种“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感觉。绩溪位于黄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结合部，既有黄山的雄奇，又有天目山的俊秀，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75.5%，可以说是有山皆绿、无水不清；举目千重秀，处处有丹青。这里有云海松涛、丹崖翠壁、云遮雾绕的清凉峰，有集奇石、飞瀑、深潭为一体的鄣山大峡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江南第一关，有与“茶马古道”齐名、被誉为“驴友天堂”的徽杭古道。因为绩溪山水的灵秀和清丽，曾引来无数的骚人墨客探秘游历，并歌咏诗赞，绩溪也因此被誉为“画里的乡村”。

**绩溪的第三个特点是“厚”，绩溪是“人文厚重”之地。**很多人都知道，安徽的“徽”源自于徽州，而很少有人知道徽州的“徽”源于绩溪的徽山、徽水和大徽村，更不知绩溪是徽商、徽剧、徽菜、徽墨的发源地。有一位到过绩溪的客人告诉我：在绩溪，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踩动一块石头，就可以触动一个朝代。早在六千多年前，绩溪的先人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绩溪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如果您有兴趣到绩溪的山村水廓之间走一走，一定会觉得这里的村落是如此的古老而生动，龙川、湖村、上庄、仁里、石家村、礪头，无不枕山、环水、面屏，其间古树参天，溪水潺潺；粉墙黛瓦、肥梁瘦栋的徽派民居坐落其中，飞檐翘角、精雕细琢的古祠堂、古牌坊，巍峨耸立。村落之间由曲曲弯弯的石板路相连，小桥流水，炊烟落日，鸡鸣狗吠，到处是古风悠悠，宛如桃花源里人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为受程朱理学的教化和熏陶，安贫守道、义薄进取、尊儒重教，因而乡间民风纯朴，百姓秀外慧中，自古以来就有“邦无游民，民无尤行”、“刑罚设而不犯，风俗美而不流”的美誉。

**绩溪的第四个特点是“灵”，绩溪是“人杰地灵”之地。**《江南通志》记载“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以新安为最。新安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以绩溪为最。”绩溪作为“程朱故里”，自古文风昌盛，民间有谚语为证：“山中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更有“牛角挂书、墙头晒字、俏媳河下对楚河、笨朝奉柜上论诗文”的说词。这里人才辈出，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治学，都做到了极致。我相信，经商的没有人不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做学问的没有人不知道曾获 36 个博士学位的国学大师胡适，当然全国更没有人不知道当今总书记胡锦涛。仅总书记家乡龙川一村，明清两代就出了 11 个进士，20 多位举人，旌表功名的牌坊有 10 余座，“一门两尚书、一族开三府”是这里的真实写照。都说人杰地灵，其实是地灵才出人杰，这是大自然的造化。

绩溪的第五个特点是“畅”，绩溪是“交通畅达”之地。这里距黄山机场仅60公里，随着绩黄高速、绩宁高速、绩谭高速和京福高铁、黄杭客专、皖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及新双线工程的相继开工建设和建成通车，三条高铁、三条高速将贯穿全境，绩溪到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大中城市的距离将大大缩短，绩溪将成为长三角名符其实的后花园。

胡适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里开篇即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又说“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五十华里。”足见先生的拳拳乡情。家乡人民对这位先哲乡贤，也始终充满了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敬意，研究胡适蔚然成风，历久不衰。在绩溪，至今还有以胡适先生命名的街道、学校、广场、小区，在上庄有适之广场、适之路等。家乡人民纪念胡适先生，不但要“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还要“以馆为碑”，建造胡适纪念馆。我们准备将毗邻适之街的县房管局迁出，在此兴建胡适纪念馆。我们企盼的胡适纪念馆，不仅要有展厅、有先生的生平资料，有研究先生的著作，而且要有会议厅、会展中心，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先生的中心。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诚挚地邀请各位专家、教授拨冗莅临绩溪考察、指导工作。谢谢大家！

## 陈宏正先生致辞

耿先生、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我是一个门外汉，照理不应该坐在台上。但是，这20多年来，有关胡先生的讨论会，我多次以一个参与者关心者参加，所以我简单讲几个我的小小的看法。

第一个，胡先生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个作家，他从15岁办《竞业旬报》开始，写到1962年的72岁，大概我算过，写过两千万字，算是多产的作家。他秉持的，他所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向上提升，能够更进步，他所主张的是民主、科学与自由。这是他终身坚守不渝、终身努力并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胡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国演讲一百多场，是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他获得很大的成功，也获得很多荣誉博士学位，最后应该是拿到36个，算是名满天下。胡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他念了《圣经》的新约，他读到“耶稣说‘收成是美好的，但是播种的人太少了’”这句话时，曾为之落泪。因为他觉得播种是辛苦的，是需要时间的，但这是将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胡先生认为，有努力才有收获，没有努力你不要想有收获。

胡先生待人非常友善，他在北大文学院院长任内，在他的米粮库住所里，每个礼拜天早上一定是开放的，三教九流的人都会来看他：要胡先生写字的，要胡先生帮忙救济的，要胡先生讲一些话的，他的礼拜天是公众时间，这是很难得的。胡先生待人是非非常热诚的，胡先生帮助过很多人，最有名，在文献上有记载的有：林语堂先生、陈之藩先生等等，还有很多人他都帮过。胡先生自奉节俭。有一次他儿媳妇跟我说：老太爷就是喜欢帮助人家，他自己穷的没有钱了，他也要帮助人家，这是胡先生精神伟大之处。所以，我有时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我都会想到胡先生，他那么穷困而对这个社会还是那么的关心、那么的照顾，这是我特别要感谢胡先生这一辈子给我这么多灵感。大陆的文化部长去年到台北去，一下飞机就是去胡适墓园和胡适故居，向胡先生行礼。文化部长来台北不是去五星级饭店，而是先到南港乡下去向胡先生敬礼。可见，中国人的心底对胡先生是充满着怀念。

今天这个盛会是耿云志先生努力的结果，我祝大会成功，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 宣读贺信

### 1, 蔡元培研究会的贺信

尊敬的各位同仁：

欣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特此函贺！

胡适先生一生与北京大学关系至深，与蔡元培先生过从甚密，历来为我会同仁所关注。我会常务理事耿云志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均为胡适研究专家，其著述为学界所熟知。无论胡适研究，抑或蔡元培研究，均为近代中国史研究之重要内容，宜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特恳请各位与会同仁更多关注蔡元培研究，共同推进中国近代史之研究。

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蔡元培研究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 2, 李大钊研究会的贺信

耿云志教授并“胡适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欣闻胡适研究会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将在南京联合举办“胡适诞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胡适研究专家汇聚南京，共同研讨胡适的文化遗产，堪称盛会，特致祝贺！

胡适是 20 世纪最杰出思想家、学者之一。李大钊与胡适均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北京大学的同事，曾共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期刊。1920 年，胡适、李大钊等人联合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北洋政府废除压制民主的法律法规，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等。1922 年，李大钊又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李大钊被害后，胡适不但参加了葬礼，还为家属抚恤事宜四处奔走。李、胡二人有深厚的友谊，而且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事业曾经共同奋斗，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他们的思想遗产。

我们预祝此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李大钊研究会

2011 年 4 月

## 大会报告及分组讨论

大会报告，报告人每人报告 12 分钟，评论 5 分钟，报告人每人回应 5 分钟。

分组讨论，报告人每人报告 10 分钟，评论 5 分钟，自由讨论 30 分钟，最后报告

人每人回应 5 分钟。请每场主持人严格把握时间。

<b>大会报告（一）</b>			
<b>时间：2011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 10: 20-11: 5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西报告厅</b>			
<b>主持人</b>	<b>报告人</b>	<b>报 告 题 目</b>	<b>评论人</b>
陈谦平	耿云志	重读《新思潮的意义》	张朋园
	张朋园	胡适的最后一天	陈方正
	陈方正	论胡适与科学	章 清
	黄克武	胡适、蒋介石与 1950 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	陈谦平

12: 00 午餐

<b>分组讨论第一场 A 组</b>			
<b>时间：2011年4月17日星期日14: 30-16: 0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西报告厅</b>			
<b>主持人</b>	<b>报告人</b>	<b>报 告 题 目</b>	<b>评论人</b>
潘光哲	欧阳哲生	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	张书克
	罗志田	道亦方法?——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争论	黄克武
	朱文华	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	雷 颐
<b>分组讨论第一场 B组</b>			
<b>时间：2011年4月17日星期日14: 30-16: 0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东报告厅</b>			
<b>主持人</b>	<b>报告人</b>	<b>报 告 题 目</b>	<b>评论人</b>
江中孝	陈红民	关于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方利山
	蔡登山	口述历史不可尽信——从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说起	段怀清
	江勇振	“胡适档案”里新发现的杜威在华演讲残稿	邹新明

16:00-16:20 茶叙

<b>分组讨论第二场 A 组</b>			
<b>时间：2011年4月17日星期日16：20-17：5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西报告厅</b>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吴根友	潘光哲	青年胡适的民主经验	何卓恩
	李建军	胡适“知行合一”的民主观浅论	邹小站
	张书克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江勇振
<b>分组讨论第二场 B组</b>			
<b>时间：2011年4月17日星期日16：20-17：5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东报告厅</b>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陈红民	陈漱渝	胡适与蒋介石：盖棺难以定论	谭徐锋
	宋广波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62）	陈红民
	邹新明	胡适归国最初四年读书交往补略	吴元康

※ ※ ※

<b>分组讨论第三场 A 组</b>			
<b>时间：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08：30-10：0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西报告厅</b>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邹小站	石立善	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与北伐	吴根友
	路文力	胡适：中国哲学里的实用主义的思想	王法周
	王法周	胡适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学科创制问题论略	石立善
<b>分组讨论第三场 B 组</b>			
<b>时间：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08：30-10：00</b>			
<b>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东报告厅</b>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欧阳哲生	段怀清	胡适与辜鸿铭：两代“海归”之间的语言文学之争	沈卫威
	沈卫威	胡适对早期国立大学中文系课程的推动	朱文华
	何光诚	美国币制借款与陈光甫领导的对日经济战	潘光哲

10:00-10:20 茶叙

<b>分组讨论第四场 A 组</b>			
时间：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10：20-11：50			
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西报告厅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章清	吴根友	简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	张德旺
	张德旺	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的胡适	汪朝光
<b>分组讨论第四场 B组</b>			
时间：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10：20-11：50			
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何卓恩	吴元康	胡适致王国维三通函札系年问题	宋广波
	程巢父	胡适的进步论	邵建
	方利山	胡适之“徽州的背景”——上庄文化生态	吴浩

12:00 午餐

<b>分组讨论第五场 A 组</b>			
时间：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14：30-16：00			
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西报告厅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沈卫威	胡文立	耐人寻味的史实	沈卫威
	胡成业	胡适与中国科学社	何光诚
	周文甫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胡适先生	路文力
<b>分组讨论第五场 B 组</b>			
时间：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14：30-16：00			
地点：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B 座二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黄克武	何卓恩	自由主义的势力、路向和学理建构——殷海光的“胡适”话语解析	吴铭能
	吴铭能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以陈独秀、胡适与雷震为中心的讨论	李建军
	章清	胡适与自由主义：一个概念史的分析	欧阳哲生

## 闭幕发言

### 张朋园教授的发言

主席、诸位学人先生们：

我不是一个胡适学者。有幸上台讲话，恐怕是完全凭着我这把年纪吧！我虽然不研究胡适，但是我对这次的会非常的印象深刻，感觉参会的大多数论文都很有内容，写的非常的好，我为大会的成功给以恭喜和道贺。

在这里想以一个外行人来看胡适研究的问题，作为我自己的一点点感想。我们常听人说胡适是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我觉得胡适的性情温和固然是天性，同时我感觉他是留美的关系。我觉得留美跟留欧洲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决然不同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阶段，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思想上的变动，跟欧美的民主政治发展的传统脱了节，从欧美式一贯的全民式的政治，一变而为威权式的政治，这一个变化对我们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诸位可以回想一下，二十世纪上半影响中国的是什么人，多半是留欧洲的，从欧洲回来的，尤其是激进主义者。对于激进主义者我跟诸位做一个武断地判断：激进主义多半是威权主义。可是美国跟欧洲的发展分手了，美国倾全国的政治学界去发展民主政治。有一个资料说，世界上有两万个政治学家，五千个分布在全球各地，一万五千个在美国，由此可见政治学的发展在美国是很受重视的一门学问。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那么热门，那么多人投入民主政治研究，就是想把民主政治如何在自己的国家走向完善无缺，也要把它传播到全世界；可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留学多半是去欧洲，不去美国。像胡适这样的人，在美国真正受到民主的气氛的熏陶，观察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能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极为透澈。我这些年来慢慢的变成一个政治学的学生，也在民主政治这个题目上下了点工夫，所以我多少能够体会胡适谈民主的心情，这一点就说明胡适的独树一帜。可是你看看许多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受激进主义者、威权主义者的影响极为深刻，他们在中国的政坛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能发生影响，是因那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家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认为激进主义可以很快把中国搞好。把激进主义当作一个理想，拼命向前，其后果如何就不顾了。我们发展到今天还是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非常的深刻。研究胡适的时候，不要忽略美国的问题，不要忽略了美国民主政治对胡适的影响。谢谢。



## 陈方正教授的发言

首先，感谢大会，让我有机会来开会，来学习。我并不是专门研究胡适的人，到这里来开会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与学习机会。

其次，让我谈一点总体感想。我先念一段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胡适日记》。这是他在哥伦比亚最后一年，快要回国了。他去费城演说，既然到了费城，就顺道去华盛顿看朱经农，他这样记载与朱畅谈后的感想：“我们预备十年以后中国人有什么思想，此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也。”所以胡适这位胸怀大志，绝顶聪明的人，在回国之前已经立定主意，要塑造，要影响中国人今后的思想。当然，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后来胡适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止于思想，他也同样影响时局和政治。但他对中国实际政治究竟有多少影响，则需要仔细研究。在这个会上，宋广波先生的文章讨论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石立善先生的文章讨论禅宗北伐，他们都用新眼光，带来了新看法。从这两篇文章出发，王法周教授更提出来，余英时的那本新书对胡适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本来大家都认为朱熹主要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一位大儒，可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本书证明，他还是一位大政治家，对时局，对政治不但热心，而且很有影响。既然如此，那么以胡适在西方特别在美国的名气和交游，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应该也值得研究，尤以抗战时期他做驻美大使那几年为然。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似乎还没有十分受到注意。

其次，我要回到我自己的主题，就是胡适与科学的关系。在我的报告中，有两个问题因为篇幅限制没有展开讨论。第一，胡适强调科学规律、自然规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 1918、1919 年间，他谈及科学特征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我是学物理学的，看到他这说法不禁眼前一亮，以为他必然是要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可是不然，他虽然知道爱因斯坦，但好像根本没有接触过相对论。他要讲的，只是十九世纪出现了非欧几何，所以欧几里德几何不再是天经地义，因此数学也不是永恒，那样的观念罢了。事实上，“科学定律是可以改进的，也是会改变的”的论调他提过好几次。可是我有点怀疑，他对这个概念实际上没有深究，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是皮尔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的基本观念之一，也是美国实验主义反对康德哲学的一部分。这相当重要，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对一般研究科学哲学的人而言，这种思想可能会被认为是 1933 年首先由当时还在维也纳学派阵营中的波普（Karl Popper）首先提出来，而它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革命性新理论所带来的后果。实际上它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的实验主义里面早已经萌芽了，那跟跟进化论的冲击可能有某种关系。无论如何，这个是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第二，科学到底是应该以学理还是以实用为主，哪个方面最重要？在这一点上胡适是有矛盾的。最早胡适反对陈独秀把科学人格化，说成是“赛先生”。那时他认为讲科学不能够过分重视“声光化电”，那只是它的表征和用途，而应该强调它的原理、精神、方法，那才是最重要。到后来他的论调却变了，认为科学是文明的一部份，而文明不但是精神，也包括物质，物质是文明的重要部份。这样，科学的实用价值之重要自然也凸显出来。他作为杜威的信徒，实验主义的倡导人，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对于胡适来说，科学的主要价值到底是在它的原理、精神、方法，还在它的应用呢？这点我没有研究，但我的感觉是，他自己也没有定论，没有一贯的思想。而且，他的演变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三，我在会上问过一个问题：他的考据学有多少是得自西方以科学手段来整理经典，例如基督教《圣经》形成过程的研究？章清回答说，他自己说学过所谓的“高等考据方法”，这在唐德刚的口述历史中提到了。这是个线索，但是还应该追寻下去。因为在西方历史和文献考据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他在哥伦比亚到底学过多少这方面的知识，上过哪些课程，其内容和参考书如何，教课的是哪位教授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同样，他累次提到，自己发动文学革命和西方的文学革命有密切关系。他在康奈尔攻读本科那几年的确修读了许多文学方面的课程，那么具体的来讲，影响他的到底又是哪些课程、书籍、思想呢？这我觉得也是值得追寻的。我猜想，目前其实还有大量资料，静静地躺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图书馆和档案（当然还有美国政府的档案）里面，等待我们去发掘和研究。

最后，今天下午何卓恩教授提到，殷海光对于胡适曾经有批评，说他提倡自由主义一辈子，可是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却显得很空疏，不但没有新的阐发，也没有认真和扎实的理论根据。这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殷海光居然会作出这样的指责，我完全没有想到。而在我的印象中，它恐怕是可以成立的：胡适在这方面的确没有在这方面发表过有分量的著作。

从此我进一步想到，胡适研究至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看胡适，似乎不再应该只用颂扬、景仰的心态，不再应该总是仰视他，而应该用平等的心态来平视、逼视他了。胡适自己最讲究实事求是，经常要求我们把事物“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也应该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世界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历程，社会学家用 disenchantment 这个词儿来形容它，这一般翻译为“解魅”。我想在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心目中，胡适都是个很伟大的人，是 larger than life，头上总带着光环的。我们景仰他很自然，可是倘若是做研究的话，这就不一定适当了，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客观性。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怎样伟大的人物都需要先经过 disenchantment，先被解魅，我们才有可能还他本来面目的。刚才何卓恩

所提到殷海光对胡适的看法，正就是一个平等、平视，还他本来面目的看法，而不再是仰视的看法。我想，在未来，倘若我们要对胡适加深了解，那么也必须朝这个方向走。更何况，从胡适本人看来，这应当也就是对他最美好的纪念，和最高贵的尊敬与颂扬。谢谢各位。

## 章清教授的发言

参加此次纪念胡适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同样也激起很多感想。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重新活跃起来，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进入大学念书，接触与胡适相关的各种文献，也构成我开展史学研究的起点。应该说，那个时候还很难体会耿先生那一代所经历的一些东西，但不断融入脑海的是这样的理念，那就是“就胡适论胡适”，还胡适一个本来的面目。80 年代重新认识胡适，这成为一个基本的诉求，以此来冲破一些禁区，冲破一些阻力，其意义自然不可轻估。这次有机会来参加会议，听了各位先生的高见，对于“就胡适论胡适”这一理念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依拙见，“就胡适论胡适”大概可以分出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就胡适论胡适”来说，在胡适本人资料的利用上过去与当下已不可同日而语。《胡适全集》等资料的出版，自是意义非凡的事，尤其值得期待的是，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很快就会把各自收藏的胡适档案资料全部制成电子资料供学界利用。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在资料的充分利用上，可以很好体现“就胡适论胡适”这样一个追求，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新近出版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就显示出在胡适本人的资料发掘上，仍可以有不少突破。其次，“就胡适论胡适”在今天还有更好的条件，那就是利用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很多资料。比如说，胡适参与创办的报章可以很好利用，包含胡适信息的各种报章今天也都可以方便加以利用。而与胡适密切相关的一些人物，他们的资料的出版，也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胡适。这次会上有好几篇有关胡适与蒋介石的论文，就是因为利用蒋的日记可以推进一些话题。相应的，“就胡适论胡适”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结合其他人、其他媒介所包含的关于胡适的信息来开展研究。第三，我个人觉得“就胡适论胡适”今天有待加强的是怎么就胡适本人所倡导的精神来开展研究。刚刚陈方正先生表达的意思我完全同意。我想表达的是，胡适强调尊重事实，冷静判断，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所开展的胡适研究，却表示出“讲狠话”

的倾向，不单胡适研究如此，其他人物的研究，也往往基于“表彰”在进行。我想这一定不是胡适本人所喜欢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秉持胡适先生所倡导的精神来开展对胡适的研究；用冷静的方法探索一些问题，以推进胡适的研究，这无疑是更值得期待的。在这次会上我提交的一篇文章，之所以要针对胡适与自由主义进行概念史的分析，也是希望厘清一些问题。因为伴随“自由主义”近些年在中文世界被重新认识，赋予胡适“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就明显包含肯定的意味。胡适之外，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被纳入自由主义的系谱中，其用心也是基于“表彰”其功业。我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检讨。

## 朱文华教授的发言

感谢大会给我机会讲几句话，我谈一点感想。

我们大陆的科学的健康的胡适研究事业，从 1970 年代末以来，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了。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还多少有些风风雨雨，但是我们毕竟走过来了，我们这个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说，我们的同行在耿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现在可以说把胡适研究这个学科研究专题抬高到了一个近似“显学”的地位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兴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行现在要考虑，我们的研究工作怎么样与时俱进的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开掘胡适研究的新思路，是不是还要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新的观念等。另外，我还有点小小的想法，就是我们搞胡适研究的同行们大都是在高校执教的，大都对学生讲过胡适的著作与思想等，其中显然有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交流，但是好像我们的几次学术会对于这个问题关注不够，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后，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关心这个问题的话，一方面可以拓宽胡适研究的方向，另外也有利于胡适思想在我们当代中国的传承。所以我有小小的建议：如果我们再开会，希望考虑安排组织一些同事来专门讨论交流一下在胡适思想、胡适作品教学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个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妥当，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张德旺教授的发言

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来开会，有很多感慨。因为 1982 年 5 月，我在近代史所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听耿云志老师讲胡适的时候，先生还是满头黑发，步履矫健，现在已经满头银发，步履沉重；我也由一个 35 岁的青年或小中年人，进入今天两鬓已苍、六十有五了！我深深感到耿老师说“胡适研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天然尺度”完全符合实际。82 年我到复旦大学图书馆，经出示吉林大学的介绍信并有蔡尚思先生电话，还说明是搜集胡适研究硕士论文资料的，才看到了一套台湾出版的《胡适文集》。资料室的老师告诉我，这是特藏室，对外不开放；你从东北来，专门搜集胡适的论文资料，又有蔡尚思先生电话，我们主任才同意让你看的。可今天，各种版本的胡适《全集》、《文集》、《书信集》、《照片集》、传记、专题资料集，胡适和相关人士、群体、学派、政派的研究专集都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两岸三地、国际范围的有关交流日见广泛频繁。这确实令人看到了胡适研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很快，看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繁荣兴旺的好气象。

我还感到研究胡适需要我们各种学科各位同仁进一步共同努力。82 年复旦大学蔡尚思先生对我说：“胡适是近代中国继梁启超之后又一个非常“博”的人，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翻译等各个领域都涉足并有建树。研究胡适必须文史哲并进，如果只通其中一种，搞不好。”今天我们的队伍已有这样的迹象，搞哲学的，搞文学的，搞史学的，还有其他专业，齐集一堂。我看我们的队伍还应该也可以扩充，我们还有努力余地，如东北，研究胡适的人就不多。

还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岸三地的联系。胡适和孙中山、蒋介石、蔡元培一样，是两岸三地学者有共同语言的人物。两岸三地学者加强联系，不仅对胡适研究，还将对中国文化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这次会上听到台湾学者的发言，就很有耳目一新之感。

非常希望我们研究会进一步发达兴旺。30 年来，耿先生带领我们取得了令海内外学术界思想界瞩目的成绩。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年轻的同志，比如咱们这两位主席，就正当青壮有为好年华，表明我们的队伍大有希望。衷心希望我们研究会一代代不断向前推进，取得更突出的成就！

谢谢大家！

## 吴根友教授发言

非常感谢大会给我提供这次学习的机会。从一开始我就说我是来学习的，对于胡适我确实没有什么研究。虽然我做中国哲学史，在大的范围属于史学，但是毕竟跟在座的大多数专家都还不太一样，在哲学思考方面做的多一点，在史料发掘方面做得少一些，用的可能都是你们发掘出来的史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做哲学的稍微跟你们有一点不同，历史学沉潜，哲学可能更重视高明，学科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当然历史学也有高明，史论中也有高明；哲学史也需要沉潜，比如对观念史的细节的梳理就需要沉潜。从去年八月到今天，近代史的会议我参加了两次，去年在洛阳参加了一次，这次参加了一次，对历史学与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差异有很深刻的体会。

从学科差异的感受来说，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哲学的反思性研究对于当代思想文化的建设性意义。今天研究胡适也好，其他问题的研究也好，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文化现象研究，都要以当今整个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为主要目标。无论是哲学史还是思想史，或者是一般的历史研究，恐怕都要与当今的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哲学的反思性研究对于我们中国当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包括对当今民主政治和自由的语言环境的追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追溯，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启示的。

我看了这次会议上的大部分文章，听了大家在会议上的讨论，对于胡适历史地位的认识从模糊转为清醒。这个认识的清晰是不是准确，我还不知道，还要求证于在座的各位专家。对于这样一个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有全面性贡献的历史人物，我感觉通过这样一个学术会议的讨论与研究，应当逐渐澄清某些事实。我相信在“祛政治化”的过程当中，胡适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旗手的整体形象或许未来更加明晰。在大陆的学术与文化语境下，大家都知道，新文化旗手被毛泽东指定了，那就是鲁迅。通过这次会议的论文与会议上大家的报告，再包括我个人以往零零星星地看了一些有关胡适研究的材料，我个人感觉，未来作为新文化旗手形象的胡适可能更加鲜明，更加明显。

我接着陈方正老师的话讲下去，侯外庐、殷海光等人对胡适也展开过批评。我是在研究明清学术的过程中，间接涉及到对胡适的研究。我想，未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形象的胡适，可能更归于平实。我看到桑兵讲国学与汉学的著作，其中将胡适与王国维比较，并引证国外汉学家的观点，认为胡适的学术成就不及王国维。但我认为，晚年胡适对戴震的《水经注》是不是抄袭问题的研究，应该还是有学术水准的。而他有关明清文学的一些考据研究，也是有学术水准的。胡适自己内心可能也想成为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地位，

使得他很难象一个严格的学者那样从容地做学问。他真正对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实际贡献，包括他引进自由主义的理论，实用主义哲学等，未来伴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更加深入，他作为一个严格的学者，或者说一个严格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会更真实和平实，这是我在此次会议后获得的一个非常粗浅的认识。

这次学术研讨会使我对胡适研究的兴趣也增加了。我也是安徽人，我觉得以往对胡适的注意不够，今天提交的论文是在大而化之的了解之后，仓促写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学术性。此次会议后，我对胡适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会分配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安徽的先贤。再次感谢大会给我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 胡适研究会副会长欧阳哲生教授作学术总结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学长、各位海内外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会议现在已近尾声，受耿先生的嘱托和会务组的安排，我在最后做一总结，说实在的，我们的会议进行到现在，可谓好戏连台，高潮不断。最后再作总结确有点画蛇添足之感。既然会务组已安排了这个程序，我只能尊命而行，完成这个程序。借此机会谈谈参加这次会议的一点感受，将我捕捉到会议的信息与大家分享，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这次会议进行了两天，会议议程安排得紧张而有序，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 70 多人，收到论文 34 篇，承蒙会务组的精心安排，将这些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论文，有序的排列到一场大会发言、十场分组发言。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粗粗阅读论文的感受，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讨论胡适的思想，这是会议的重点。围绕胡适思想研究的论文可分为四组：（一）对胡适思想的理解。耿云志的《重读〈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指出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发表时，正值五四运动引发全国政治运动的高潮期，《新青年》，同人的原有的不太显露的思想分歧，开始逐渐表面化。胡适的这篇带有前瞻性的总结文章，表明他坚持思想文艺方面的变革路线，并系统提出一个建设新文化的纲领。这个纲领同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所持的立场，保持着高度紧密的内在关联。文章最后对“革命主义思维”做了反省，提醒人们注意胡适当年的渐进改革思路和主张。罗志田的《道亦方法？胡适等近代学者关

于“一以贯之”的争论》是一篇贯通古今的论文，它从朱子对孔子的“一以贯之”解读开始，谈到近人章太炎的解读，再到胡适的解读，以及胡适与章太炎的争论。罗文认为，胡适是素重古代“语法”的，故对基于小学的言说容易心领神会。他对章太炎见解的商榷未必成立，但其有一个不小的贡献，在于明确点出“一以贯之”是“孔子的哲学方法”。这即使不是发明，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他和章太炎一样着重“阐一知十，举一反三”的取向，不过一说“类比”，一说“推论”而已。朱文华的《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一文认为，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胡适是最清醒、自觉和鲜明的“文化使命感”的一位，他对于“文化使命感”的反复提出及其践行，实质乃是一种“文化报国”。胡适的这种文化使命感是从“五四”以来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之一。欧阳哲生的《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一文认为，胡适是继严复以后又一位介绍西方近世思潮的大师，与严氏获得较为稳定的定评不一样，胡适在这方面饱受争议，这既与他传播的西方近世思潮所产生的歧义有关，也与他本人较为亲西方的立场有关。胡适终身持行的进化论的渐进观、存疑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实为其“美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吴根友的《简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一文着眼胡适的“历史的眼光”这一大历史的观念，并将其与清代历史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龚自珍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考察胡适的“历史的眼光”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其特殊的历史贡献。作者注意到，胡适虽提倡实证的科学方法，但没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程巢父的《胡适的进步论》一文论及近代中国的两种进步观：胡适的和平渐进的改良观与激进的革命之争，对它们作了平实的讨论。程文认为，胡适生于乱世，乱世是枭雄、流氓、痞子驰骋之纪，新世纪如有新的政治家出现，必当用先生之谋，表现了对胡适渐进改革路线理解的态度。

（二）有关胡适民主政治思想的阐释。潘光哲的《青年胡适的民主经验》一文通过叙述胡适从观察美国总统大选，到接受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再到崇信美式民主，最后成为“美式民主拜物教”的信徒兼传教士的双重角色这样一个过程，还原了胡适的“美国经验”。文章最后发问：前世代的知识分子追求希望的民主，究竟是那一种民主的疑问，值得我们思考。李建军的《胡适“知行合一”的民主观浅论》一文认为，胡适的民主理念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哲学之上的，虽然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知行合一”的认识与实践原则，但是由于近代化的“知”与“行”都被赋予新的内容，胡适的“知行合一”的民主观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相联系，胡适的“知行合一”民主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张书克的《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自由论〉》一文，通过发掘、梳理胡适与约翰密尔的



《自由论》的相关材料，认定胡适受《自由论》的影响相当大。胡适早年读过《自由论》的中文译本和英文原本，早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隐含有密尔的《自由论》的深层影响，其知识论上的基础，则是密尔在《自由论》中表述的思想。可以说，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多方面来源于约翰密尔的《自由论》。胡适非常重视《自由论》的启蒙意义和思想价值。

（三）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阐释。何卓恩的《殷海光的“胡适”话语解析》一文，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想都会追求社会实现，在此奋斗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三类角色：致思缜密的学问家、执着勇毅的启蒙政论家和坚强有力的组织家。自由主义当亦如此，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致思缜密的学问努力很少，坚强有力的组织缺乏，比较有成就的只有启蒙和政治。殷海光的“胡适”论说对自由主义势力的期待，对自由主义学理建构缺位的痛心，对宣导自由主义的理念的思想启蒙和政论批判的坚守，折射的正是这样一种面貌。吴铭能的《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以陈独秀、胡适和雷震为中心的讨论》一文，从陈独秀的见解，谈到胡适、殷海光、雷震等《自由中国》宣扬的理念，对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历史境遇作了一个历史回顾。章清的《胡适与自由主义：一个概念史的分析》一文，从“五四”时期“西方的分裂之阴影下自由主义被贬损谈起，到胡适 1926 年赴欧洲考察时受到“苏俄经验”的刺激，提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以拯救自由主义，再到国共两党及其他政治派别的“命名”，最后到胡适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表述和自我定位。章文认为，1945 年以后，自由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才获得各方面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四）有关胡适的科学观及其胡适对哲学、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陈方正的《论胡适对科学的态度》一文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经验出发，认为胡适一辈子提倡的“十字真言”，不过是一个历史考证学家的理念与自然科学方法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因子。由于自然科学和考证学无论在理念上、方法上的差别是如此之巨大，这所谓最大公约因子亦即“十字真言”实际上意义不大。当然，陈文也提出胡适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背景薄弱，但看到了未来潮流，为科学呐喊，这是值得表彰之处。读完陈文，我们感受到他是从俯视的角度对胡适作一解读，把胡适看成古典时期的范本，既然是“古典”的，既是经典，又很幼嫩。这与大陆学者大多是从仰视的角度看待胡适不一样。涉及到胡适与哲学学科的论文有三篇：石立善的《胡适禅宗史研究与北伐》、路文力的《胡适：中国哲学里的实用主义的思想》、王法周的《胡适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学科创制问题论略》。涉及到文学学科的有段怀清的《胡适与辜鸿铭：两代海归的语言文学之争》和沈卫威的《胡适对早期国立大学中文系课程的推动》两文，段文对“五四”时期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由文言、白话之争发端，扩展到白话文学及新文化运动上加以探讨。

作者提出，与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路不同的是，辜鸿铭昌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图，恰在其强烈的非西方式现代化和反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在于他对现代化多元化多样性的坚持。作者猜测辜鸿铭离开北大有胡适的因素存在。沈文谈到清末民初国立大学中文系课程改革，以及胡适通过参加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推动和落实“国语统一”、“文学革命”的主张。作者认为，中文系的课程改革最具中国特色和具有同西学并立、对峙的强势。中国的语言、文学和典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和精神传承的依托，中文系课程由北京大学所确立的文学、语言、典籍整理三大板块，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重建和多民族融合过程中，各家大学中文系取法的依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来一直坚持这种学科制度。

第二大类是讨论胡适的生平事迹和胡适与他的朋友。张朋园的《胡适的最后一天》一文从回忆胡适最后一天在酒会讲话时倒下的情景开始，回溯了胡适一生的心脏病史，对胡适的身体史做了一个有趣的探讨，我以为张先生如能就此问题继续发掘材料，铺陈一篇大文，应是胡适研究中一篇颇有新意的文字。蔡登山的《口述历史不可尽信——从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说起》一文从1961年5月2日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谈到胡适对《许世英回忆录》的质疑以及考证、订正，讲到回忆录撰写的谨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江勇振的《胡适档案里新发现的杜威在华演讲残稿》一文谈到自己在“胡适档案”里发现的杜威在华讲演留存的八篇完整的讲稿，这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杜威原稿，它为我们比较原稿和译文之间的误差提供了新材料。江文由此出发，指出夏威夷大学1973年出版的一本由中译版翻回英文的杜威讲演，其实也存在许多翻译上的问题。江先生刚出版大作《胡适传》第一卷，祝愿他尽早出版第二卷。邹新民的《胡适归国最初四年读书交往补略》一文将1917——1921年胡适在北大的藏书及其题跋辑出，再现了胡适当年在忙碌的读书和交往中的情况，这是一项具有文献价值的工作。希望新民能将《胡适藏书目录》早日付梓出版。吴元康的《胡适致王国维三通函札系年问题》一文对1925年胡适致王国维信札的时间依据各种直接、间接的材料，做了精细的考证。吴氏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胡适全集》的补佚和订正工作，我以为这样的文献整理工作值得做下去。张德旺的《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的胡适》一文利用确凿的历史材料，说明五四时期胡适坚决支持爱国学生，积极参与“挽蔡”斗争，主编《每周评论》坚持斗争，还原了五四时期胡适的历史形象，纠正了过去一些流传的、不确的说法。胡适的亲属、同乡胡文立、周文甫、方利山、胡成业分别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胡适》、《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胡适之先生》、《胡适之的“徽州背景”——上庄文化生态》、《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等文，对胡适与亲人、胡适与故乡、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或亲人真挚的回忆，做了感人肺

腑的叙述。此外，何光诚的《美国币制借款与陈光甫领导的对日经济战》一文用大量英文的材料，呈现了中国战时借款的艰难，该文虽非直接讨论胡适，但论及胡适的朋友，对我们认识胡适的朋友兼助手陈光甫的工作有相当助益。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个热点，围绕这一问题有四篇论文。黄克武认为胡适的《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与1951年胡适致蒋介石的一封信对蒋介石的《反共抗俄基本论》和《苏俄在中国》两书及其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反共抗俄是当时蒋介石和胡适等自由主义派人士的共识。陈漱渝认为蒋、胡之间在承传旧学、容纳新潮，在对待西方文化接受方面，在赴苏俄实地考察以及对苏俄社会主义的矛盾游移态度，两人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同或类似之处。胡、蒋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苏反共，胡、蒋的冲突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冲突演绎出许多故事，值得人们回味。宋广波则根据新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认为1949年以后胡、蒋之间的良好关系只是表面的，他们在表面亲密的背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实质上是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它是胡适推行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与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发生强烈冲突的结果。陈红民披露了《蒋介石日记》中记载的有关蒋、胡交往的材料，从蒋这一方面对胡、蒋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揭示。陈文提到“蒋中正档案”留存有1951—1955年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九份往来的电报，差不多每隔半年，蒋介石指示给胡适5000美金，但陈文没有对这些钱的用途作具体交待或考证。过去一直有蒋介石拨给胡适宣传款的说法，这些钱究竟是用于补助胡适的生活费还是宣传费，值得进一步考证。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大家提供的论文和倾听大家的发言，我感觉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准比我预期的要好一些。大部分论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有些论文是作者精心构织和打造的成果。有些新锐作者的论文读后让人产生“后生可畏”之感，这使我们有信心地说，胡学研究后继有人。

女士们、先生们：

胡适研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近三十年可以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年代我们打破禁区，出版了几部专著和传记，发表了上百篇论文。1990年代，我们在绩溪、北京、青岛、上海等地相继召开了胡适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中华版的《胡适学术文集》、北大版、人民文学版的《胡适文集》、黄山书社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海外也成立了胡适研究会，出版了《胡适与他的朋友》丛书，在台北、香港召开学术研讨会，影印出版了《胡适的日记》。新世纪的前十年，又经各方合作，我们推出了《胡适全集》，在北大、绩溪、台北等地召开了座谈会、纪念会。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千篇论文、上百种著作、三十多篇博士论文以胡适为主题，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胡适研究成为一门显

学的确是俨然成形。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海内外同仁协同合作，与时俱进，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创造更多、更好的成果。

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旅途愉快！

2011年4月18日下午于南京大学

## 文章选登

### 胡适的最后一天

张朋园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复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逝世。

是日上午，中研院第五届院士会议选举新科院士，七人当选。下午举行闭幕酒会。在会场上，院士们分别讲话。首先胡适回忆中研院从大陆搬迁至台湾十余年的重建，同时展望会后的发展。他以话家常的方式发表谈话，轻松愉快。他说院士吴健雄、吴大猷都是他的学生，吴大猷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也都得了诺贝尔奖。但他话锋一转，说这些成就都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有的。“五四”以来，“四五十年了，我们所倡导的科学，怎么还未能在中国生根？”他要大家各叙己见，作一个检讨。当时讲话的人有凌鸿勋、李济、吴大猷、刘大中等。李济的谈话似乎直接响应胡适的话题：“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我真不敢乐观。”吴大猷接着说：“我们严格的看看自己，我们的基础实在很薄弱。仔细想想，真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科学不在国内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环境。”

大家讲完之后，胡适站了起来说：“我还想再说几句话。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太太叮嘱，不要多讲话，现在太太不在身边，我就偷着再讲几句。”他归纳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内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随后，他把话题引到另外一个方向：言论自由。他称赞台湾的言论比从前自由了。“大家可以到监察院去看看，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

胡适的话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他想讲的应该是民主。五四思潮的两大主轴，一是赛先生（science），一是德先生（democracy）。大家讲科学，为什么不谈民主？话到嘴边留半句。那时候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不容许在公开的场合批评时政，民主话题还是禁忌，不得不以言论自由来敷衍一下。但这样的迂回，欲言又止，实在不是滋味。他有点激动，也许身体已经感到不适，所以打住话锋：“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下午六点半钟，客人相继离开会场，有人上前与胡适话别。忽然胡适的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旁边的钱思亮连忙伸手扶他，但已来不及了。他的头先碰到桌沿，再晕倒在磨石子的硬地上，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参照胡颂平编着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加上我的现场记忆，作了上述的简要回忆。

在此，我要继续谈一谈胡适的健康与心脏病问题。

胡适似乎因为先天的体质稍弱，加上后天的过度操劳，才导致他后半生困扰的病痛。胡适在《四十自述》书中说：“我小时候身体多病。”“三岁了，我的身体瘦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又说：“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坎。”

青少年时期，胡适的健康似乎有所改进。在上海读书时，注意体操功课，“很用力做种种体操，”才有较为充沛的体力。

但胡适的健康潜藏着心脏病的危机。1920年，协和医学院一位徐教授为他看病，“疑是心脏活门不大灵活，”间接的通过友人转告胡适，要他不可大意。所谓的心脏活门不太灵活，就是医学上的心室心房的瓣膜闭锁不全。徐教授要胡适“好好保养，也可以多活二三十年”。三十岁就发现有心脏病，对胡适是不胜困扰的。但他能活到七十岁，超过了徐教授的估计。

47岁时胡适第一次心脏病发作。1938年12月4日晚间，胡适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接着与几位朋友一同吃消夜。忽然感到胸部左侧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朋友递给他一杯白兰地酒，胡适一饮而尽，病情就这样缓和了下来。他并没有立即住进医院，第二天照常出门演讲。赵不凡医师为他诊察，说昨夜的病是 Heart Attack（心脏病），他才意识到严重性，随即住进了医院（Harkness Pavillion: The Presbyterian Hospital），一住就是77天。医院检查的结果，正式的诊断是冠状动脉阻塞。胡适在日记中记为 Coronary Occlusion。

1961年2月25日，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原先，已经伤风两天，晚间赴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感到有些疲倦。宴会还没有开始，就觉得呼吸困难，脉搏跳得很快（高达140次），额上出汗不止。友人扶他在一个小房间休息。钱思亮来了，立即打电话给台大医院，心脏科主治医师宋瑞楼赶了过来，将胡适抬上汽车，直奔台大医院，给氧气，打强心针，过了三小时才稳定下来。宋瑞楼的诊断，是 Heart failure，亦即冠状动脉栓塞，还加上心室闭锁不全、心律不整等现象。这次住院56天，于4月22日出院。

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时，胡适69岁，相去第一次发病已23年。迈入了老年时期，他的健康状况也自此恶化。1961年7月11日，不知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清晨一点钟光景开始泻肚，是一种水泻，一连三次，他的手脚冰凉，脉搏竟然完全没有了，幸而特别护士在身边，急忙用力拍打他的胸部，两分钟之后才醒转过来。中研院院医赶来打了一针，水泻止住了。台大医生来到，上氧气，打葡萄糖生理盐水，血压渐趋稳定，又渡过难关，但元气大伤。一年之后第三次发病，无法救治。

胡适的心脏病，用今天的医药水平来看，并不是绝症。冠状动脉的阻塞，可以用心导管（by-pass 或支架）手术改善心脏本身的血流循环，可以装置人工心瓣膜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今天已有许多药物可以减轻胆固醇、三酸甘油酯、尿酸等对心脏和血管的不良影响。可惜胡适生不逢辰，没有生活在医药发达的今天。

胡适一生乐观自己的健康，不受心脏病的困扰。1961年4月29日，胡适在闲谈中说：“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里把下半世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的精力都透支了。银行要偿还下半世的透支，我可以还给银行；如果还可以让我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

由于他的乐观，往往便忽略了自己的疾病。孜孜不倦的态度对健康是不利的。胡适往往读书到深更半夜。他说，“我作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即便在生病的时候，也不放弃阅读，”医生常常将他手边的报纸杂志没收了，他会哀求似的说：“我是个有看书习惯的人，……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吧。”护士劝告他按时作息，往往把他的灯关了，他只得乖乖的睡觉。

胡适曾经有几十年抽香烟的习惯，直到晚年才放弃，香烟对心脏病是不利的。

综合言之，胡适因为不愿在公共场合批评时政，所以在院士会议上谈到科学而不提及民主政治。但他的心理是不平衡的。或许由于心理的不平衡，才引发了心脏病的。我们揣测胡适压抑自己的心理，是他以为与蒋介石有若即若离的友谊，他可以直接影响蒋介石。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胡适曾多次劝告他走向民主的道

路，例如容忍反对党、将国民党改为两个政党，那知老蒋竟在日记中大骂他是“一个最无品格的文化买办。”胡适的用心可谓完全白费。

胡适以 67 岁高龄出任中研院院长职务，以他衰弱的健康状况及台湾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实无必要。在职三年余，无所作为，终于死在任上，正是“过河卒子，只有向前”的最真实写照。

（初稿）2011 年 4 月 8 日

## 耐人寻味的史实

胡文立 胡毓平

我的父亲胡成之是胡适之的堂弟，今年春节我们胡家的三十多人，在北京的徽商故里有一次聚会，大家品尝了胡适一品锅，同时聊起了家族的往事，有些鲜为人知，都是耐人寻味的史实。

七七事变前夕，我家搬进安徽绩溪会馆。我的堂兄胡思孟在西山养完肺病后也来我家居住。他因父母早亡，没人照看，我的父亲特意接他来北平一起住的，他比我们兄弟大十几岁，我们叫他思孟哥。后来听母亲说我的父亲胡成之因胡适做了中华民国的驻美大使，日本人竟把他抓走了，并把我们家也监视起来，是思孟哥翻墙逃出，去找了一位日本留学的医生朋友，父亲被关了 21 天才被保释出来，思孟回来时还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胡思孟因只读过两年私塾，他到北平后就在铁路出版社印刷厂做排字工，直到退休，他是 95 年病逝的。

在聚会中思孟的二儿子胡毓平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去世后，他们家受到的一些牵连。他说：“57 年我才 9 岁，我朦胧的记得，有一天傍晚家里来了加急电报，第二天父亲就去了唐山，几天后回来了，我在父亲带来的报纸上认出了三叔胡思杜的照片，听说三叔是大右派，我也不懂什么是右派，又过了不久的一天，法院来了一帮人，抄了我们家，抄走了一个书架和一些瓷器，后来才听父亲说，他去唐山是给思杜处理后事的，家里被抄走的那些东西，是胡适留在我家的。”

胡毓平又说：“66 年我在工业学校上学时，文革开始了，不准我参加红卫兵，我不理解，当时学校很乱，我到学校人事室强行看了我的档案，才知道是因为我父亲是胡适的堂侄，我真是很不理解，我根本没见过胡适，我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影响我了。在这之后，随着运动的发展，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的情绪有些不对头，

第二天我到父亲的印刷厂，才看到有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批斗“走资派”和“历史反革命”时也被拉出来陪斗，我找到了他们厂的人事干部，我打了他，并强迫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说原因有三：（1）为胡思杜处理后事，并为他立一木碑；（2）接受思杜几年的经济补助；（3）取回了思杜的遗物（几件衣服几箱书籍和几百元人民币）。几天后更大的灾难降临，父亲被赶出了北京，当时我家是有很困难的，我们兄弟六人，母亲早已去世，大哥大姐已经结婚，二姐刚刚工作，两个弟弟在东北插队，我在工校上学，父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父亲先是到上海铁路局报道，后派他到淮南做炉前工，重体力劳动，他的身体是不可能承受的，生活条件又差，因此经常生病。我借串联的机会去看他，他正在生病，一个人躺在黑黑的类似工棚的屋里，我看了非常难过，第二天我带他去看病后，他不让我回宿舍，直接要我上火车，他是怕我了解更多他的情况，在这之后大约一年左右，大环境有些变化，他回到了北京，在家养病，但半年后又要他去了宝鸡，这回的工作还算比较轻松，是在火车司机的招待所做勤杂工，由于他不声不响，人又勤快，招待所整理的干干净净，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他的身体和心情使他又得了一场大病，胃出血，我接到电报，赶到宝鸡，看到人已经快要不行了，当时宝鸡武斗很凶，好的医生都在打扫厕所，司机们很热情的告诉我，有一位马医生是宝鸡最好的外科大夫，他们陪我一起去找医院的革委会，一定要请马医生回来为我父亲动手术，我说手术失败我负责，不给动手术我和你们拼命，他们勉强答应了，我又给马医生下跪，求他给父亲看病，结果 12 小时的手术成功了，又养了半个多月才回京，捡回了父亲的一条命。”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是因为给胡思杜处理后事，竟遭遇了这样待遇，他的下一代也连带的受到了不公平的政治待遇，这不值得深思吗？

回想起来 2001 年我和老伴及二哥友立去美国旅游，并去看望了堂兄胡适的长子胡祖望，他谈到弟弟思杜之死时，非常难过，流着泪说：“思孟为我弟弟处理后事，我们非常感激。”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为了这样一件人之常情，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事，竟要思孟遭到了一系列的灾难，几乎丧命。

现在思孟的儿女已经五六十岁了，今天的环境已经轻松了许多，我们终于能在一起谈论充满着许多遗憾和无奈的往事。

## 陈之藩先生提交本次会议的书面发言



按，陈之藩先生是著名作家。在青年时期，直接受过胡适先生的教诲，与胡先生通过信。现在住在香港，老年多病。下面的书面发言，是据他口述记录下来的。

从 1955 年我去美国到 1958 年他到台湾，正是胡适之先生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我才可能有与他聊天、谈心、说短道长的幸运。他是位多忙的人！这段期间之前，我在北平；之后，我在台北；各见过他一次。初次相会时间十分钟，因贺麟要向校长商量学生的急事而打断；第二次谈话的时间也不到二十分钟，为副总统陈诚的造访而打断。两次合在一起不过半小时。在美国，尤其我在纽约市的三个月，我常到胡寓闲谈，应以小时计了。所谈的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益常出我意外。这是我在《在春风里》的序中追述与胡先生之间的种种因缘。胡先生 1962 年逝世至今，竟然已有 40 年了。我自己也从大学生而老兼病，依然时时想起他来。听到大家在胡先生诞生 120 年之时想着他，念着他，谈论着他，我心欢喜。

## 附录

### 与会人员名录 (以姓氏笔画为序)

姓名	联络方式
山口荣	日本硃见学园女子大学文学部
方 英	230051 《安徽史学》编辑部
方利山	245021 安徽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
王汎森	台北中央研究院
王法周	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石立善	200234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吕 晶	210093 南京大学历史系
朱文华	200433 复旦大学中文系
江中孝	510610 《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
江勇振	美国德保大学
何光诚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何卓恩	430079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吴元康	230053 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吴根友	430072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吴 浩	10008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铭能	610064 四川大学历史系
宋广波	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书克	100040 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
张朋园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宪文	210093 南京大学历史系
张德旺	150001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李又宁	美国圣若望大学
李 玉	210093 南京大学历史系
李庆英	100734 《北京日报》理论部
李 佳	10008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李建军	1000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金荣	210093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汪朝光	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沈卫威	210093 南京大学中文系
邵建	211171 江苏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邹小站	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邹新明	100871 北京大学图书馆
陆发春	230039 安徽大学历史系
陈于武	100009 当代中国研究所
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陈红民	310028 浙江大学历史系
陈宏正	台湾，胡适研究的参与者与支持者
陈谦平	210093 南京大学历史系
陈漱渝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鲁迅博物馆
周文甫	245300 安徽省绩溪县胡稼民研究会
季蒙	200092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欧阳哲生	100871 北京大学历史系
罗志田	100871 北京大学历史系
郑峰	100006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姜良芹	210093 南京大学历史系
段怀清	200433 复旦大学中文系
胡文立	胡适先生亲属
胡成业	245300 安徽省绩溪县
徐子超	245300 安徽省绩溪县中学
秦贤次	台湾文史学者
秦素银	100009 北京市东城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耿云志	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章清	200433 复旦大学历史系
黄克武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程巢父	上海，文史学者
路文力	俄罗斯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
雷颐	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蔡登山	台湾作家
谭徐锋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潘光哲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

##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